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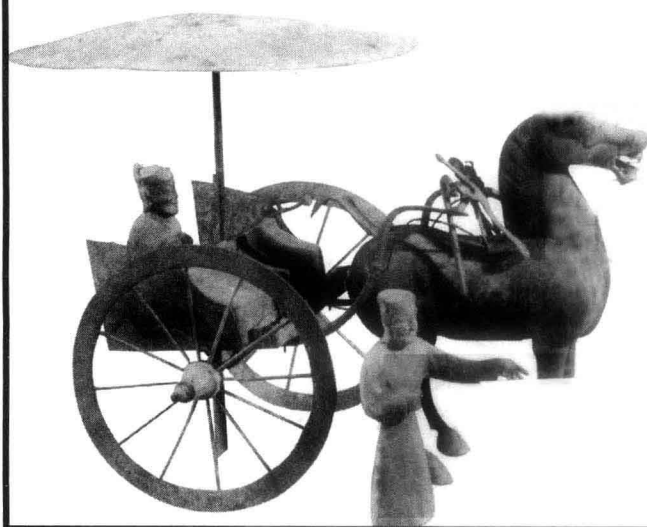
中国全史



中国全史

第二卷

远方出版社





通史

中
卷





文成公主进吐蕃

唐太宗灭了东突厥后，又派李靖击败了西南的吐谷浑（我国古代民族之一，在今青海省），打通了西域的通道。西域各国纷纷和唐朝交往，远在西南的吐蕃（我国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政权）也派使者来了。

当时的吐蕃赞普（吐蕃王的称号）名叫松赞干布，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才。他在十三岁的时候，就精通骑马、射箭、击剑等各种武艺，而且爱好民歌，善于写诗，受到吐蕃人的爱戴。他的父亲去世后，吐蕃贵族发动叛乱，松赞干布靠他的勇敢才智，很快把叛乱平定了。

年青的松赞干布并不满足吐蕃的贵族生活，为了学习唐朝的文化，他派出使者，长途跋涉，到长安来要求跟唐朝建立友好关系。

唐太宗也听到吐蕃的名声，愿意跟他们结交，还派使者到吐蕃去回访。

过了两年，松赞干布又派使者到长安向唐朝求亲，唐太宗没有答应。吐蕃使者怕松赞责备他不会办事，回到吐蕃后，向松赞撒谎说：“唐天子快要答应把公主下嫁给我们啦，因为吐谷浑王也去求亲，才把我们求亲的事给耽搁了。”

吐蕃和吐谷浑两国本来就在闹摩擦，松赞干布听了使者的回报，更加怨恨吐谷浑。他马上出动二十万人马进攻吐谷浑。吐谷浑王看吐蕃军攻势很猛，抵挡不住，就退到环海一带。

松赞干布打败了吐谷浑，乘胜打到唐朝境内的松州（今四川松潘），又打了个大胜仗。松赞干布骄傲起来，派人威胁唐朝说：“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带兵打到长安。”

唐太宗生气了，派大将侯君集带兵反击吐蕃。吐蕃将士对松赞干布挑起跟唐朝的战争，本来不愿意，看到唐朝派大军前来，都要求退兵。松赞干布眼看蛮干下去，要遭到失败，就向唐朝求和。

唐太宗本来愿意同吐蕃友好，也就同意讲和了。

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又派了个能干的使者禄东赞带了一百人的出使队伍，备了五千两黄金和许多珍宝的厚礼，到长安去求亲。

唐太宗接见了禄东赞。禄东赞传达了他们的年青国王想跟唐朝友好的心愿，说得娓娓动听。唐太宗心里挺满意，就在皇族的女儿中，挑选一个美丽温柔的，封为文成公主，把她许嫁给松赞干布。

据说，使者禄东赞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后来，在青藏高原的人民中，流传着一个“五难求婚使”的动人故事：

禄东赞在长安求亲的时候，各国来求亲的使者很多。唐太宗下了一道命令，要



前来求亲的使者先解答五个难题。哪一国使者能够解答，就答允跟那国和亲。

第一道题目是要求把一根很细的丝线，穿过一颗有九曲孔道的明珠。禄东赞把丝线系在一只蚂蚁的腰部。蚂蚁带着丝线，爬过明珠的九曲孔道，丝线也就带过来了。

第二道题目是把一百匹母马和一百匹小马驹儿放在一起，要求辨认出哪匹马驹儿是哪匹母马生的。禄东赞把母马和马驹儿分开关了一天，断绝了马驹儿的饲料和水。第二天，再把它们放在一起。饿慌了的马驹儿分别奔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去吃奶。它们的母子关系也就认出来了。

禄东赞通过了一道道考试，最后一道是要从二千五百名美貌年青的女子中，找出谁是文成公主。禄东赞凭他敏锐的眼力，一下子就把那仪态大方的公主认出来了。

这些传说不大可能是事实，但是却反映了吐蕃人民对唐蕃友好的愿望和完成这个使命的使者的赞美。

公元641年，二十四岁的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动身到吐蕃去。唐朝廷为公主备了一份十分丰富的嫁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当然是少不了的，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吐蕃没有的谷物、果品、蔬菜的种子，药材，蚕种。她还带了大批的医药、种树、工程技术、天文历法的书籍。

文成公主出嫁的消息传到吐蕃，从唐朝边境到吐蕃，一路上都有人准备好马匹、牦牛、船只、食物，接送文成公主。松赞干布亲自从逻些（今西藏拉萨）赶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或札陵湖）迎接。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在那里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婚礼结束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越过雪山高原，到了逻些城。公主入城的那天，逻些人民像过盛大节日一样，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松赞干布还在逻些按照唐朝的建筑格式，为公主专门建造了一座城郭宫殿，给公主居住。

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四十年，她为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联系和发展藏族经济文化作出了贡献。直到现在，在西藏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还供奉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

公元650年，松赞干布死去，唐太宗也在前一年病死，接替他的是太子李治，这就是唐高宗。

亲王相争

这时又发生了皇位继承问题。早在即位初，唐太宗即已立嫡长子承乾为太子，后来承乾患足疾，行动艰难，而四子魏王泰，从小就爱好文学，越来越受到唐太宗



的宠爱，不仅特令在王府中设文学馆，任由他自己招引学士，而且每月物质上的供应，也都超过太子。随着父皇对自己宠爱的不断加深，魏王泰开始谋夺承乾的太子地位。看到“太宗微有废立之意”，文武群臣也“各有附托，自为朋党”。魏征从保持最高统治集团的稳定出发，极力维护承乾，并向太宗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为相，想通过这两位文臣武将掌握朝政，以达到稳定太子地位的目的。太宗也看到侯君集的杰出才能，在侯君集破高昌后，便以他在高昌私取珍宝，将士竞为盗窃为名，将他下狱，不久虽将他释放，但也不予重用，想以此来考验侯君集对自己是否忠诚。侯君集没有能经受这个考验，太宗也就把他搁在一边了。这样，宰相中就没有更多的人支持承乾。贞观十七年（643年）初，朝廷中关于废承乾，改立魏王泰的议论多了起来，连唐太宗也不得不公开向群臣表示，不准备以其他王子取代嫡长子承乾，开启窥窬之源。

就在太宗表示不废承乾后的第三天，魏征逝世，承乾在朝廷中失去了最后的依托。承乾出于保存自己太子地位的考虑，原来即与侯君集和杜如晦之子驸马都尉杜荷等联结，现在形势变得更加险恶，承乾便与他们积极策划、谋杀魏王泰。此事为承乾所养刺客纥干承基所告发。承乾终于被废。侯君集被处死，杜正伦被贬。魏征也被怀疑与杜正伦、侯君集同党，唐太宗废除了魏征之子魏叔玉尚衡山公主的决定，并推倒了亲自撰文、书石的魏征碑。

承乾被废后，岑文本、刘洎和崔仁师建议立魏王泰为太子。长孙皇后弟长孙无忌则坚持要立太宗九子晋王李治。褚遂良支持长孙无忌的意见。承乾也申诉自己“但为泰所图，时与朝臣谋自安之术，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耳。今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考虑到，如果立魏王泰，则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会给后代留下一个恶劣的榜样，而且承乾和李治也都要被李泰害死。因此，接受长孙无忌的意见，立李治为太子。这是关陇贵族的一次重大胜利。

刘洎被杀与李勣贬出

唐太宗很清楚，仅仅依靠长孙无忌等少数关陇贵族以及依附于关陇贵族的江南士人褚遂良等少数人，是无法治理日益繁杂的政务的，也不可能有力地辅佐未来的皇帝。因此，他继续重用马周、刘洎等一批出身一般地主的大臣。同时，为太子配备了一个既有关陇贵族于志宁又有一般地主出身的马周等人组成的太子属官班子。他还利用李玘生病，前往探视的机会，对这位在立太子问题上没有明确表态的一代功臣名将表示亲近，并在一次宴会上口头上向李勣托孤，对李勣说：朕求群臣可托孤幼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但是，由于门阀观念作怪，唐太宗对非关陇贵族出身，特别是一般地主出身的大臣的疑忌也日益加深。曾想拥立李泰



为太子的刘洎，出身寒素，与有佐命之功的张亮先后被借故杀掉。岑文本、马周相继病死。杜正伦已被放出，崔仁师也被借故贬出，中枢机构中来自一般地主和中下级官吏家庭的，只剩下了年事已高的张行成和威望不算很高的高季辅，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唐太宗临终前，还怕李勣将来不能效忠李治，把他黜为叠州都督。按照太宗事先的考虑，如果李勣接受任命后立即启程，李治即位后就招他回来担任仆射，以作为左膀右臂。如果李勣徘徊观望，就立即杀掉他，免得日后李治无法控制，用心真可谓良苦。机敏过人的李勣，又有侯君集、刘洎的先例，焉能不体会唐太宗的深意？受诏后，不至家而去，通过了这次生死考验。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十八日，出身关陇贵族，立有卓越战功的伟大军事家，韬晦终身才得以善终的李靖也死了。七天后，二十四日，唐太宗虽不无遗憾，但总算是放心地死去了。临终前，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卧内，对他们托付后事：“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

科举制度的完备

唐代科举制在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二种。制举主要试策，由皇帝临时定下名目考选。制举名目繁多，有直言极谏科、贤良方正科、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军谋越众科等百数十种。这是一种网罗非常人材的考试，平常人和官吏都可以应考。考中者，原是官吏的立即升迁，未入仕的由吏部授予官职。唐文宗以后，制举始实际停废。常举每年举行考试，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唐初，秀才科等级最高，唐太宗以后，士人趋向开始转向明经和进士二科，尤以进士科为重。在贞观二十三年中，进士共二百零五人，在高宗、武则天统治的五十五年中，据不完全的记载，进士有一千余人，平均每年录取的人数较贞观时增加一倍以上。玄宗以后，进士科的地位更加突出，官僚虽位极人臣，但如果不是进士科出身，“终不为美”。

各科考试内容不同。明经主要试贴经，即选择考生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仅露一行，用纸帖遮盖部分字句，测试其背诵经书的能力。这种考试比较容易。进士科在隋代仅试策，唐太宗时曾加试经史。唐高宗末年又加试诗赋杂文。天宝年间始专试诗赋。考试成绩分上中下三等，上等、中等为及等，下等即落第。每年应考者或八九百人或一二千人不等，能及等者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由于考生多而录取名额少，所以考中进士非常不易。一旦及第便名闻士林，号称“登龙门”。明法科试律令，明算试《九章》、《夏侯阳》、《周髀》等数学著作。明书科试《说文》、《字林》等字书。这三种科目是为选择专门人才而设，考生被录取后只能在和专业有关的机构任职。秀才科仅试策，取消了隋代加试的杂文。由于录取标准异常严



格，及第者屈指可数。此科渐渐成为一种虚悬的科目。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又创立武举科。州县以下习艺者每年被推举至兵部课试。所试科目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考试通过者，兵部即除官给禄。唐代武举亦属常举，但不重要。

参加科考者有二种来源。一种是国子监和州县学的生徒，由学馆荐举至尚书省参加考试。另一种是不在学馆，直接来自州县者，称为乡贡。他们首先自己在州县报名，即所谓“怀牒自列于州县”，经州县考试合格后，再举送至尚书省参加考试。允许考生自由报考，这是唐代科举制较之隋代更加完备的一个重要标志。

考官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唐初由吏部的考功郎中主持科考，贞观以后，由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以员外郎位望较轻，遂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科考，后成为定制。开元中，礼部考试通过后送中书、门下详覆。宰相如不同意，可以改动。详覆之制屡兴屡废。礼部考试是取得出身资格的考试，考中者，仅取得进士及第或明经及第的资格，尚不能正式做官，只有再通过吏部铨试，才能释褐除官，故吏部试亦称“释褐试”。吏部铨选的主要标准是身、言、书、判。身指体貌丰伟，言指言辞辩证，书指书法遒美，判指文理优长。

唐穆宗、敬宗都曾下令科考及第者免徭役，唐武宗明确规定进士科出身的称“衣冠户”，有免除差科色役的特权。

礼部考试一般是正月考试，二月发榜。及第进士科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同时及第者称“同年”。

唐朝入仕的途径除科举制外，还有门荫和流外入流。唐初，由此二途入仕的官员远比科举出身的人多。以后进士出身的宰相逐渐增加，到德宗、宪宗之际，由科举入仕的宰相及高级官吏才占了多数。科举制成为向地主政权输送官吏的主要渠道。这是选官制度的一个进步，在削弱门阀士族等级特权、扩大唐政权的社会基础，提高官吏文化水平诸方面，科举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以后，历经宋元至明清，虽考试内容、方法有所变化，但科举制度本身一直相沿不替。

科举制在实行中也存在某些弊端，曾出现冒名顶替、漏泄考题等舞弊现象。尤为严重的是座主、门生、同年结为朋党，相互援引，宦风由此败坏。牛李竞争中，牛党领袖李宗闵和牛僧孺就是同年进士，牛党骨干令狐楚、萧俛与皇甫湜亦有同年之谊。他们主张选用官吏以词彩居先，其党人经常“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古员阙”。他们通过进士科举结成势力雄厚的私党，往往一门父子兄弟都从进士起家，住居显要，成为新兴的进士贵族。由此，科举制为中小地主广开仕途的作用也大大降低。这些弊端到宋代因糊名、誊录的新规定的实施而得到克服。



长孙无忌排斥异己

高宗即位后，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少詹事张行成兼侍中，以检校吏部尚书、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辅兼中书令，并以长孙无忌为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褚遂良仍为中书令。这是唐太宗晚年精心安排的一个宰相班子，其中有长孙无忌这样的皇亲国戚，于志宁这样的代袭箕裘的关陇军事贵族，也有作为开国功臣和山东一般地主的代表人物张行成以及具有功臣、武将和一般地主三重身份的李勣。他既考虑到关陇贵族的核心地位，也考虑到一般地主在政权中的作用，基本上保持了各派政治力量的平衡。

但是，由于长孙无忌以皇舅和顾命大臣的身分把持朝政，他在褚遂良的支持下，从永徽元年（650年）六月到永徽三年九月，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把宇文节、柳奭、朝瑗、来济等关陇贵族官僚提拔为宰相，并迫使李勣辞去了尚书左仆射职务，让他做一个挂名的宰相。随着张行成、高季辅在永徽四年先后死去，一般地主在朝廷中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

长孙无忌排斥一般地主出身的大臣，扩大关陇贵族权势的做法，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很不相称的。社会上一般地主正在发展，要求朝廷中有他们的代表人物。地方和朝廷中的中下级官吏，已大多由一般地主子弟担任。高级官吏乃至宰相中，一般地主出身的，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因此，长孙无忌竭力扩大宰相中关陇贵族成员的人数，垄断政权，并不是关陇贵族集团强大的结果，而是他们在日益壮大的一般地主势力面前虚弱和恐惧的表现。他们可以利用自己在最高统治机构中的核心地位得逞于一时，但是，这种缺乏基础和现实脱节的情况，是不可能维持多久的。

这时正好发生了废王立武的问题。

征讨西突厥

唐朝初年，新疆地区控制在西突厥手中，唐和西突厥还处在对立状态，因此，唐朝政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这种人为的政治上的隔绝，使得玄奘西行取经时，过武威后便必须“昼伏夜行”。在玉门关外到伊吾（今新疆哈密）之间的戈壁滩上，玄奘迷失道路，水袋中的饮水又失手覆没，被困了四夜五天，险些丧失了性命。

就在玄奘犯禁西行的第二年即贞观四年（630年），唐打败了东突厥，伊吾归唐，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王麴文泰入朝。“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唐与西域的交通初步打开，但不久高昌又在西突厥的支持下，东击伊吾，西破焉耆，并遏绝西域朝贡，阻挠西域诸国与唐通商。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



宗派侯君集消灭了高昌割据政权，唐以高昌之地为西州，原为西突厥所据的可汗浮图城为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并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守。这时唐在西域的势力，“西至焉耆”，龟兹、于阗、疏勒（今新疆库车、和田、喀什）等地仍处在西突厥的控制之下。但是，由于西突厥各部互争雄长，内部矛盾重重，加之西域地区广大，西突厥无力严密控制各国，因此，西域各国一方面臣于西突厥，同时又与唐建立了朝贡关系。贞观十八年（644年）玄奘西行返国到达于阗后，国王即遣高昌人马玄智随商旅奉表入朝，唐太宗敕于阗等国派使人和驼马把玄奘护送到且末，玄奘得以顺利地到达敦煌。中西交通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贞观二十二年（647年）唐以阿史那社尔为昆山道行军大总管，率军攻破龟兹。西突厥、于阗、安国争馈驼马军粮。唐在西域的影响大为增强。同年，唐把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到龟兹，统焉耆、疏勒、于阗和龟兹四镇。此后，唐与西方的交通，特别是从敦煌经且末、于阗（今和田）越葱岭而西的南道和出玉门关经西州、龟兹、疏勒越葱岭而西的中道就更加畅通了。

唐王朝虽然设立了安西都护府，但唐在西域的统治主要依靠各族酋长。唐虽然在南疆设立了安西四镇，但所驻的军队是不多的。唐在西州只驻守了千余人，破龟兹后，立叶护为王，亦未见派兵戍守的记载。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刚被唐任命为瑶池都督并委以招集西突厥未服者和统治北疆重任的原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在听到唐太宗的死讯后，便自号沙钵罗可汗，征服了西突厥各部，并于次年七月攻陷庭州金岭城及蒲类县。唐赶紧把安西都护府迁回西州。这时唐正处在三征高丽之后的恢复时期，无力进行大规模征讨。刚刚设置不久的安西四镇就这样废弃了。

显庆二年（657年）唐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营，平定了阿史那贺鲁的叛乱。唐于碎叶川（今楚河）东西分置昆陵和蒙池二都护府，原来西突厥所役属的诸国也都设立都督府和州，由各族首领担任都督、刺史，并隶安西都护府。次年，唐在讨平了龟兹大将羯猎颠的叛乱以后，于五月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这是第二次把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故《旧唐书·高宗本纪》特标明是“复于龟兹国置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也同时恢复。据《唐会要·安西都护府》引苏冕论及《通鉴》卷二百一咸亨元年记事，此时所恢复的四镇仍为龟兹、于阗、疏勒和焉耆，碎叶（今托克马克南）仍未列于四镇。但是，由于唐的军事力量已及于碎叶地区，唐在原西突厥统治区又都设立了州府等行政机构，这样，无论是从南道或中道越葱岭而至中亚，还是经庭州或龟兹而至弓月（今新疆伊宁东北）、碎叶一带的丝绸之路就都畅通了。吐鲁蕃出土的麟德二年（665年）《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中关于京师人李绍谨在弓月城一次就举借了二百五十匹绢去龟兹，以及证人



毕娑从弓月西走等记载，具体反映了当时此道上丝绸运输和商旅往来的情况。

攻打高丽

西域的形势初步稳定后，唐把视线又转向了东方。早在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就曾以高丽原东部大人泉盖苏文杀害高丽王作为借口，亲征辽东。他在定州对侍臣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之余力以取之。”因此，他虽然同时派张亮泛海趋平壤，而主攻方向还是放在辽东，进一步完成统一的意图是很明显的。由于高丽人据城坚守，唐军在攻下辽东、盖牟后，与高丽军民相持于安市（今辽宁牛庄附近）城下，虽然运用了巨大的攻城撞车和可将三百斤的巨石抛于一里之外的抛车等最新武器，围攻了四个月，仍不能攻下，东北冬来早，天寒粮尽，草枯水冰，人无粮，马无草，唐太宗只好撤军。

正当唐朝集中力量进攻辽东的时候，漠北的薛延陀乘机进犯河套。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646年），派江夏王李道宗等分道击灭薛延陀，又派李勣招降原来服属于薛延陀的铁勒诸部。唐太宗亲至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接受了铁勒诸部所上天可汗尊号。唐还根据铁勒诸部的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参天可汗道，设立六十八个驿站，以供来往使人的食宿和马匹。

贞观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他又根据朝臣们的意见，两次派偏师泛海到高丽进行骚扰，让高丽疲于奔命，农时荒废。高丽困弊，唐太宗认为时机成熟，准备发三十万兵，一举击灭高丽，并下令在剑南道伐木造船舰。这时正好唐太宗去世，唐对高丽的战争暂时停了下来。

高宗即位后，朝鲜半岛上三国之间的攻战更加激烈，高丽和百济的联军屡次攻打早在贞观时就已臣附于唐的新罗。显庆五年（660年），新罗王金春秋上表求救，唐高宗不仅想要完成父亲没有完成的统一全国的任务，而且还企图乘机控制朝鲜半岛，派苏定方率水陆军十万，自成山（今山东成山角）渡海，攻占百济都城，百济王义慈投降。百济故将福信据周留城，从倭国迎回故王子丰。丰为百济王后，向倭国请求救兵。龙朔三年（663年），唐将孙仁师、刘仁愿与新罗王法敏率陆军进攻周留城，带方州刺史刘仁轨率水军及粮船准备与陆军会师途中，在白江口（锦江口）与倭国水军遭遇，四战皆捷，焚倭军船四百艘。百济王扶馀丰逃奔高丽，王子忠胜等率众投降，唐军占领了百济全境。

乾封元年（666年），高丽泉盖苏文死，长子泉男生继为莫离支。泉男生与弟男建、男产发生争斗，走保国内城（今吉林辑安），派子泉献诚向唐求援。唐高宗派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辖诸军攻打高丽。总章元年（668年）三月，唐将



薛仁贵攻拔扶馀城（在今吉林怀德一带），九月，李勣攻占高丽首都平壤。唐在高丽设立都督府和州县，并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进行统辖。

边疆形势的变化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边疆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的统治激起了高丽和百济人民的不断反抗，他们和新罗联合起来，抗击前往镇压的唐军，唐在高丽和百济的统治很难维持下去了。

吐蕃的兴起，对唐构成了更大的威胁，七世纪初，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力量强大起来，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把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双方关系密切起来。永徽元年（650年）松赞干布死后，大相禄东赞执掌大政，吐蕃开始把势力伸到青海高原，逐步吞并了吐谷浑的牧地。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可汗诺曷钵与弘化公主被迫率数千帐走依凉州（今甘肃武威）。咸亨元年（670）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今和田）攻陷龟兹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唐罢安西四镇。唐派薛仁贵为逻些道行军大总管，准备在青海反击吐蕃。禄东赞之子论铁陵率兵数十万迎战，大败唐军于大非川。此后，唐与吐蕃在青海开始了长期的争夺。

唐在对少数民族和对外的战争中开始处于守势。

从显庆二年（657年）苏定方率兵攻打西突厥，到六十年代对高丽的战争，唐一直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这时朝野皆以征战为意。唐高宗要完成太宗未竟之业，锐意在边疆上进取；朝廷大臣也鼓动高宗进行战争。由于贞观、永徽以来，唐王朝对东征西讨的战争中死亡的将士都要派敕使吊祭，追赠官爵，并将死亡者的官爵授给其子孙；战士经过一次战役，即可得一转勋官。因此，一般地主和富裕农民最初也是积极参加这场战争的。“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他们希望在战争中获得勋赏和官职，使自己富贵起来。战争是这个时期政治生活的中心。但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勋赏日益减少，战死者也不再有人过问。一般地主富裕起来以后，不再愿意从事这种无利可图的以生命作赌注的游戏。一般百姓也对从军不感兴趣，每逢“州县发遣兵募，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躲，便即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对外战争从内部也逐渐失去了支持。

武则天建言十二事

武则天采取种种手段做了皇后以后，在一段时期内，曾通过担任宰相的李义府



和许敬宗对朝政发生过较大影响，显庆五年（660年）高宗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或使武则天决之，武则天开始直接参与政事的处理。但其地位，并不是十分稳定的。武则天“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的做法，以及李义府恃中宫之势，专以卖官为事，且把高宗的警告不放在眼里，都引起了高宗的不满。龙朔三年（663年）十月，“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少者，皆委太子决之”。麟德三年（664年）高宗更命上官仪草诏废武则天。虽然经过武则天的“自诉”，没有废成，上官仪也被杀掉，但《通鉴》所云，自是“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也并不尽然。在麟德至咸亨（664—674年）年间，在唐的基本国策的确定上，从现存史料，还看不出武则天到底起了什么作用。高宗用人，也并不以对武则天的态度为标准，曾经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裴行俭，就受到高宗的一再提拔。总章二年（669年），李勣死。咸亨元年（670年）许敬宗致仕（退休）后，宰相中不再有武后的心腹。咸亨四年（673年）“三月丙申，诏刘仁轨等改修国史，以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故也”；上元元年（674年）“九月癸丑，诏追复长孙晟、长孙无忌官爵”，也都是对着武则天来的。

武则天长期不能执掌大权有各方面的原因，诸如女子不能参政的传统观念影响，等等，而其中政治威望不够，缺乏官僚和下层的广泛支持；唐朝的政府结构和宰相制度和官员的构成两点，尤有很大关系。

唐朝实行三省制，并且确立了宰相政事堂议事的制度，凡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均需先由宰相在政事堂议决然后由中书省起草制诏，经门下省审核，呈皇帝批准后颁布执行，不经过中书省和门下省，皇帝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样，军国大事的最后决定权虽仍操纵在皇帝手中，但在决策时宰相和中书省、门下省的官员的发言权都是很大的。特别是给事中、黄门侍郎和侍中有封驳否决之权，更是对君权的一种限制，这对于防止皇帝越出常规行事，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唐高宗健康情况的恶化，武则天谋取最高统治权的活动也更加紧张了。在她做皇后进入第三个十年的时候，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元675年1月28日）武则天上表建言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在十二事中，武则天提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指老子李耳），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每岁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一方面这是要表明自



己是李唐皇权的忠实维护者，而更重要的却是提出了要以道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实行无为而治。而无为而治在当时最重要的是停止战争，第三事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就把这两者具体而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了。一、二、四、五等事提出的轻徭薄赋，发展生产，都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六、七事提出的广开言路，杜绝谗言，要求建立良好的政治风气，也是为了保证这个方针的实行。

第九事，父亲健在，为母亲的服丧期由一年改为三年。表面是要把女的地位提到和男的一样，实际是为自己要以一个女子来掌权而制造舆论。

最后三事中提出的勋官已给告身（证书）的不再追核，八品以上官员增加俸禄，低级官员久不提升的晋级，则是满足中小地主和下级官吏的要求，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十二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适应了唐在边疆由进攻转为防御，中小地主和中下级官吏要求在政治上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形势。武则天建言十二事说明她再次抓住了潮流，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唐王朝就是按照她提出的建言十二事行事的，高宗临终前发布的《改元弘道诏》：“比来天后事条，深有益于为政，言近而意远，事少而功多，务令崇用，式遵无怠。”固然是为武则天评功摆好，但也并非虚言。正是由于建言十二事的实行，武则天才逐步掌握了人心。

女皇帝武则天

唐太宗是个精明能干的皇帝，但是他的儿子高宗却是个庸碌无能的人。唐高宗即位以后，自己不会处理朝政大事，一切靠他的舅父、宰相长孙无忌拿主意。后来，他立了皇后武则天，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武则天本来是唐太宗宫里的一个才人（一种妃嫔的称号），十四岁那年，就服侍太宗。当时太宗的御厩里，有匹名马，叫“狮子骢”，长得肥壮可爱，但是，性格暴躁，不好驾驭。

有一次，唐太宗带着宫妃们去看那匹马，跟大家开玩笑说：“你们当中有谁能制服它？”

妃子们不敢接嘴，十四岁的武则天勇敢地站了出来，说：“陛下，我能！”

太宗惊奇地看着她，问她有什么办法。武则天说：“只要给我三件东西：第一件是铁鞭，第二件是铁锤，第三件是匕首。它要是调皮，就用鞭子抽它；还不服，用铁锤敲它的头；如果再捣蛋，就用匕首砍断它的脖子。”

唐太宗听了哈哈大笑。他虽然觉得武则天说的有点孩子气，但是也很赞赏她的泼辣性格。

唐太宗死了后，按照当时宫廷的规矩，武则天被送进尼姑庵。这当然是她很



情愿的。

唐高宗在他当太子的时候，就看中了武则天。即位两年后，他把武则天从尼姑庵里接出来，封她为昭仪（妃嫔的称号）。后来，又想废了原来的王皇后，立武则天做皇后。这件事遭到很多老臣的反对，特别是高宗的舅父长孙无忌，说什么也不同意。

武则天私下拉拢一批大臣，在高宗面前支持武则天当皇后，有人对高宗说：“这是陛下的家事，别人管不着。”唐高宗这才下了决心，把王皇后废了，让武则天当皇后。

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就使出她那果断泼辣的手段，把那些反对她的老臣一个个降职、流放，连长孙无忌也被逼自杀。

不多久，那个本来已经十分无能的高宗害了一场病，成天头昏眼花，有时候连眼睛都张不开。唐高宗看武则天能干，又懂得文墨，索性把朝政大事全交给她管了。

武则天掌了权，渐渐不把高宗放在眼里。高宗想干什么，没有经过武则天同意，就干不了。唐高宗心里气恼，有一次，他跟宰相上官仪（上官是姓）商量。上官仪是反对武则天掌权的，就说：“陛下既然嫌皇后太专断，不如把她废了。”

高宗是个没主意的人，听了上官仪的话，说：“好，那就请你去给我起草一道诏书吧。”

两个人的说话。被旁边的太监听见了。那些太监都是武则天的心腹，连忙把这件事报告武则天。等上官仪把起草好的诏书送给高宗，武则天已经赶到了。她厉声问高宗说：“这是怎么回事？”

唐高宗见了武则天，吓得好像矮了半截。他把上官仪起草的诏书藏在袖子里，结结巴巴地说：“我本来没这个意思，都是上官仪教我干的。”

武则天立即下命令把上官仪杀了。

打那以后，唐高宗上朝，都由武则天在旁边监视；大小政事，都得由皇后点了头才算数。

公元683年，高宗死了。武则天先后把两个儿子立为皇帝——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都不中她的意。她把中宗废了，把睿宗软禁起来，自己以太后名义临朝执政。这一来，又遭到一些大臣和宗室的反对。

有个官员徐敬业被武则天降职，借这个由头，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武则天找宰相裴炎商量。裴炎说：“现在皇帝年纪大了，还不让他执政，人家就有了借口，只要太后把政权还给皇帝，徐敬业的叛乱自然会平息。”

武则天认为裴炎跟徐敬业一样，都想逼她下台，一气之下，就把裴炎打进牢



监；又派出大将带领三十万大军讨伐徐敬业。徐敬业兵少势孤，抵抗了一阵，就失败了。

接着，又有两个唐朝宗室——越王李贞和琅琊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也被武则天派兵镇压了。

经过这两场小小的兵变，全国恢复了安宁，没有人再敢反对武则天。武则天巩固了她的统治，就不满足太后执政的地位了。

有个和尚猜到了太后的心思，伪造了一部佛经，献给武则天。那部佛经里说，武则天本来是弥勒佛投胎到人世来的。佛祖派她下凡，就是要让她代替唐朝皇帝统治天下。

又过了几月，有个官员名叫傅游艺，联络了关中地区九百多人联名上书，请求太后即位称帝。武则天一面推辞，一面提升了傅游艺的官职。结果，劝她做皇帝的人越来越多。据说当时文武官员、王公贵族、远近百姓、各族首领、和尚道主，上劝进表的有六万多人。

公元690年九月，武则天接受大家的请求，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她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

宰相构成格局的初步变化

武则天没有能在宰相中抓住一批亲信，因此，在上元二年（675年）三月高宗议使武后摄知政事时，便遭到宰相郝处俊和中书侍郎李义琰的反对。高宗又欲禅位皇太子。在这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四月二十五日，太子弘不明不白地暴死在合璧宫。太子弘死后，高宗终于暂时停止了把权力交给妻子还是传给儿子的摇摆，于六月初五立李贤为太子，并于八月二十七日以张文瓘为侍中，郝处俊为中书令，确定了新的宰相班子。正因为如此，这个宰相班子一方面要执行武则天提出来的基本政策，而另一方面，比起以往几个时期又具有更加浓厚的反对武则天直接执掌政权的色彩。

这个时期的宰相班子，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这个时期宰相中一直担任侍中和中书令，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张文瓘和郝处俊。张明经出身，郝进士出身，都是文士，这与前一时期刘仁轨兼右相（中书令）姜恪兼左相（侍中），武将处于核心地位，是一个鲜明的对照。这时，唐王朝由于边疆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在边疆由进攻转为防御，高宗实际上实行了武则天“息兵，以道德化天下”的建议，在边疆以防御为主，在内地则与民休息。基本国策转变，宰相核心随之也发生变化。

但是，由于边疆形势的不断紧张，防御的任务仍相当艰巨，因此，不仅刘仁轨



以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而且刘仁轨和李敬玄还先后以宰相为洮河军镇守使和洮河道行军大总管，宰相中出将入相和以相为将、将相合一的做法却保持了下来。还有，郝处俊曾为李勣副手次江道副大总管，颇有胆略，张文瓘、李义琰也都曾在太原为李勣属官，是与武将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因此，这个核心还有一种过渡的性质，从以武将为核心到以文士为核心的过渡。

二是由于武则天所提出的基本国策一直在实行，因此，从上元元年到调露元年（675—679年），宰相的变动不大，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宰相班子。

三是这个宰相班子的成员仍然是由贵族和一般地主家庭出身的官员组成，但成员情况与唐初又有了很大变化。

从出身来说，郝处俊、戴至德、薛元超、来恒都出身于贵族高官家庭，郝处俊是唐开国功臣许绍外孙，侍中、平恩公许圉师外甥，甌山县公郝相贵之子。好读《汉书》，略能暗诵，贞观中举进士，按照以门资出身者，县公从六品上叙阶的规定，释褐时被授与著作郎（从六品上）。后袭爵甌山县公。总章二年（669年），拜东台侍郎，寻同东西台三品后，一直担任宰相。高宗对他的评价是“志存忠正，兼有学术”。

戴至德是贞观名臣宰相戴胄兄子，胄无子，以至德为嗣。他处事“慎密”，故自乾封二年（667年）与张文瓘同时知政事，到仪凤四年（679年）正月逝世，一直担任宰相。

薛元超是隋代著名文学家薛道衡孙，李世民秦府十八学士薛收之子，娶巢刺王李元吉女和静县主，高宗即位后，擢拜给事中，时年二十六岁。他好学，善属文，上元三年（676年）迁中书侍郎寻同中书门下三品，“特承恩遇，常召入与诸王同预私宴，又重其文学政理之才”。

来恒，是来济异母兄，隋代名将来护儿之子。来济虽因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而被贬死，高宗并未因此而摒弃来恒。

这四个人的父祖都是贵族高官，但又不是西魏北周关陇贵族，而是在隋末唐初厕身贵族高官行列的，但同时他们又与皇室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有的且有封爵，因此，又不同于一般新贵。他们虽不一定直接以门荫入仕，但在释褐叙阶时，都得门荫之助，因而年轻时即至高位。

中级官吏家庭出身的有李敬玄、李义琰。李敬玄父孝节，谷州长史。敬玄博览群书，特善五礼。贞观末，经马周，许敬宗推荐，进入东宫崇贤馆兼预侍读。李义琰，父为县令，少举进士，博学多识，曾为太原尉、白水令，李勣甚礼之，为相后，宅无正寝。在私人生活上是很注意检点的。

一般地主出身的有刘仁轨，张文瓘和高智周。